施莱尔马赫和伯艾克对 诠释学方法论的不同建构

牛文君 彭启福

摘 要 施莱尔马赫被认为是近代方法论诠释学之父,他对诠释学有两大贡献:一是创立了普遍诠释学;二是引进了心理学诠释方法,这种心理学取向使得其诠释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作为施莱尔马赫的弟子,伯艾克虽然也致力于诠释学方法论的普遍化,但他对语文学领域的固守使得其诠释学以语文学为基本取向,具有更强的知识论色彩和理性主义特征。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诠释学和伯艾克的语文学诠释学构成近代方法论诠释学的两种重要路向。

关键词 心理学诠释学 语文学诠释学 方法论

作为关于理解和解释普遍技艺的诠释学,诞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①。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对诠释学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是对诠释学提出“重建”的要求,即在疏异的传统碎片中重新发现和建构“意义”;二是理解的方式在最终意义上只能采取个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形式,乃至包括个体之间神秘的心灵沟通。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把诠释学的对象从经典文本(比如圣经、法典、古典著作)中解放出来,并在语法解释之外引进心理学解释方法,要求读者通过心理移情重构作者的创作过程,像作者那样甚至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他对理解中个性、体验、天赋、灵感、感觉、想象力等非理智因素的强调,使得他的诠释学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施莱尔马赫开辟的心理学诠释学路向对历史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兰克、德罗伊森、狄尔泰等把心理学解释方法运用到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上,狄尔泰甚至把诠释学提升到精神科学

普遍方法论的高度。

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中,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诠释学方法论路向与心理学诠释学路向交相辉映,这就是以施莱尔马赫的弟子伯艾克为代表的语文学诠释学方法论路向。在施莱尔马赫创立普遍诠释学之前,语文学中已经存在着零散的诠释实践,沃尔夫和阿斯特两位语文学家被视作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先驱。施莱尔马赫对这种基于零散经验的“特殊诠释学”不满,致力于创立普遍诠释学。伯艾克一方面继承着语文学的传统,把理解和解释的主要对象

^①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盛行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一方面掀起挖掘民间文学的热潮,浪漫主义者收集整理民间故事、传说、童话和歌谣,作为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抗,渴望挽回正在消失的传统;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手法上与古典主义(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相对,反对以古希腊和罗马文艺为典范,侧重彰显人类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力量,把直觉、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

仍然限定在经典文本上,并突出强调诠释学的知识论层面,另一方面沿着施莱尔马赫开辟的道路,致力于诠释学的普遍化,把诠释学提升为语文学的普遍方法论。伯艾克在语文学领域深化和推进了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并弱化了其浪漫主义特征。可以说,他的语文学诠释学是对古典与浪漫进行调和的一种尝试。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有两个地方最为引人注目:其一,诠释学对象和方法上的普遍化诉求;其二,诠释学方法上的心理学取向。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诠释学是避免误解的技艺,它的对象涉及一切与语词有关的对话、言语、文本等,既包括书面的,也包括口头的;既包括历史的,也包括当下的;既包括经典的,也包括通俗的。诠释学的对象不再是特定的文本,所以他的诠释学又叫做“普遍诠释学”(或译为“一般诠释学”)。不仅从诠释学的对象来看,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是“普遍的”,其普遍性还体现在他试图创制一套系统的、普遍有效的方法技艺,以便指导解释的实践。

施莱尔马赫认为,在他之前只有具体的诠释学,没有普遍的诠释学,“诠释学作为理解的技艺还不是普遍的,而只是诸多具体的诠释学”^①。以往语文学实践中发展出的诠释学不过是观察结果的堆积和经验规则的搜集,只是各种特殊诠释学(Spezialhermeneutiken),仅当理解产生困难时语文学家才考虑到解释的技艺,对这些理解困难的情况进行搜集观察,并放在特定领域中予以查明。“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就是这样产生的,语文学家眼里只有具体的[解释]目的”^②。的确,沃尔夫本人曾明确宣称,诠释学和批评作为技艺“更多的是通过实践性的阐明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理论。它们只应当以个别指导的形式被发展。尽管我们不能马上拥有关于它们的完整体系,却有关于这个和那个理论之点的个别的”^③。在语文学家那里,诠释学是在解释实践中对规则的搜集,并且这些规则因解释对象的不同而相异,从而就有诗歌诠释学、历史诠释学、法律诠释学等。施莱尔马赫认为,以往语文学家所做的诠释学工作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这些规则只是零散的观察结果的汇集和堆积,所以不具有科学性;二是这些规则在应用领域具有局限性

和狭隘性。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不管是神学文本还是世俗著作,不管是经典文本还是一般文本如报纸上的文章,不管是文本还是讲话、对话,一切与语词相关的地方都存在正确理解的问题,诠释学应该是“普遍的”,无需从解释对象上区分各种不同的具体诠释学(如神学诠释学和世俗诠释学,即 Hermeneutica Sacra 和 Hermeneutica Profana)。诠释学的技艺只有一个,只是在不同的对象上对这同一种技艺有不同的运用而已,其中一些方面突显出来,其他方面退而隐之。

与诠释学对象上的普遍化诉求紧密相关,施莱尔马赫在诠释学方法上从历史—语文学拓展到心理学。由于诠释学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经过特别选择的经典文本和神圣著作,“文本被认为是作者的思想、生活和历史的表现”^④。诠释学需要运用心理移情的方法富有创造性地重构出作者的创作过程,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重新认识作者的思想。

施莱尔马赫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浪漫主义对整体和无限的追求,以及对个性、体验、天赋、灵感、感觉、想象力等非理智因素的强调,在其普遍诠释学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认为,读者运用天赋、想象、体验,通过心理移情能够进入并理解作为个体的作者的思想 and 情感世界,从而能够理解作者所创作的个性化的作品。因此,在语法解释之外,施莱尔马赫引进另一种重要的解释类型,即心理(技术)解释。语法解释和心理(技术)解释乃是基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划分出的两大解释类型,前者侧重含义的客观方面,即含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后者侧重含义的主观方面,即含义的特殊性和个性;前者旨在忘记作者从共性方面理解语言,这里人作为语言的器官,语言通过人表达自身,后者旨在忘记语言从个性方面理解作者,这里语言作为人的器官,人通过语言表达自身;前者的任务是从语言出发

①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诠释学》), Hrsg. von Heinz Kimmerle,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59, S. 79.

② 同上书,第 86 页。

③ Wolf, *Fr. Aug. Wolf's Vorlesung über die Encyclopädi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 (《沃尔夫古典科学百科全书讲演录》), Hrsg. von J. D. Gürtler, Leipzig: Lehnhold, 1831, S. 271.

④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

(不考虑作者的特殊性)确定出统一的客观含义,包括弄清语言在形式要素和内容要素上的使用,后者的任务是从作者出发理解语言的风格和个性。按照施莱尔马赫的表述,语法解释和心理(技术)解释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者同样重要,从根本上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如果说语法解释较为低级,心理解释较为高级,那是不恰当的”^①。只能在不同的意义上说哪一种解释更高级,“如果把语言仅看作中介,个体通过这种中介传达其思想,那么心理解释是更高级的解释;语法解释仅在于扫除暂时的[理解]障碍”。“如果把个体仅看作语言的场所,把个体的言语仅看作语言表现自身的场所,那么语法解释就是更高级的解释。心理解释则完全是第二位的,如同个体的一般存在”^②。一般来说,语言表达越具有客观性,越需要语法解释,越具有主观特征,就越需要心理(技术)解释。

心理(技术)解释的主要任务是理解作品的基本思想和作者的意图与个性。在施莱尔马赫这里,对作品的理解和对作者的理解是相互交织的,一方面要从作者的个性和整个生命出发理解其作品,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作品的研究把握作者的个性和思想。心理(技术)解释的出发点是语言的个性,施莱尔马赫认为,语言的个性首先表现在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个性,直观对于语言来说具有根本意义,不同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直观方式,因此根据直观建构出来的语言也就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在语言表达上形成各自的民族风格,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原始语言中的语词很难有完全对应的关系。实际上用这个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语言之间的完全翻译是不可能的。语言的个性还表现在,即使在同一种语言内部,不同的作家对语言的使用也会打上个体性的烙印,其个性必然体现于语言表达之中,这就是作家的风格。“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简言之,风格就是描述的个性特征,“风格无非体现在[作品的]布局安排和语言表达上”。心理(技术)解释的任务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把握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征。风格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能被理解为概念,而只能被理解为直观”^③。施莱尔马赫经常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心理解释和技术解释这两个概念,但又对两者做了细致的区分,他把广义的心理解释具体划分为纯粹的心理解释(rein psychologische

auslegung)和技术解释(technische auslegung),前者旨在弄清作者个体性的、心理的、不确定的和流动的内在冲动与本能,后者旨在弄清作者事先慎重考虑的、方法的和技术的创作方式;前者侧重从个体的全部生命环节中研究其思想的起源,后者侧重追溯特定思想和描述的序列发展;前者在于理解作者的“念头”及其思想萌芽的发展过程,它是一种自由的思想游戏,后者在于理解作者的创作方式和冥想;在前者那里人是自由的,在后者那里,形式的力量占统治地位^④。

伯艾克的诠释学是在继承和改造以往语文学诠释学和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在诠释学的对象上,伯艾克与传统语文学家一样,仍然固守于语文学领域。其次,在诠释学方法的普遍化上,推进和深化了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方法论。

伯艾克仍然沿着语文学的传统路线,把理解和解释的对象主要限定在古代经典文本上;同时他把理解本身作为语文学知识的认知方式,并使诠释学成为语文学的首要的普遍方法论。伯艾克认为,语文学是“对整个人类精神创造物的认识”^⑤,“对既有知识的认识叫做理解”^⑥,语文学的目的在于全面认识古典文化,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这一界定与传统语文学家基本上是相通的,又有微妙差异,这也使得诠释学在其各自语文学中的地位不同。沃尔夫亦主要在古典文化学的意义上理解语文学概念^⑦;阿

①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诠释学》), Hrsg. von Heinz Kimmerle,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59, S. 81.

② 同上书,第 81 页。

③ 同上书,第 116 页。

④ 参见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und Kritik* (《诠释学与批评》), Hrsg. von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 S. 179, 181—184, 196.

⑤ August Boeckh, *Encyc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语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 Hrsg. von Ernst Bratuschek, Leipzig: Teubner, 1886, S. 10.

⑥ 同上书,第 53 页。

⑦ 沃尔夫描述了语文学概念及其含义的演变,他认为,在近代人们把它当作关于语言的知识,语文学成了语言学,实际上语文学应该是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即古典文化学,其含义远远超出了语言知识(参见 Fr. Aug. Wolf's *Vorlesung über die Encyclopädi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 Hrsg. von J. D. Gürtler, Leipzig: Lehnhold, 1831, S. 10.)

斯特把语文学规定为“对古典世界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核心在于描述“古典文化的精神”^①。值得注意的是，在伯艾克这里，对古典世界、古典文化的认知方式本身是理解，“物理的推测和实验显然不是它（指语文学）的任务，同样逻辑的或政治的调查也不是其任务”^②，这实际上已经为狄尔泰从方法论角度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划界开了先河（“我们说明自然，理解精神”）；语文学家的任务不仅是“理解”，还在于“解释”，即向外界描述和传达，使古典文化成为可以理解的，诠释学应该成为建构语文学知识的方法论。伯艾克还对这种认知提出科学性的要求^③，语文学不应该只是零散知识的收集和汇编，而应该是运用诠释学以科学概念为基础的体系化描述，诠释学作为方法论有责任为这种描述的科学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证^④。因此，诠释学的地位在伯艾克这里突显出来，它不再仅仅是游离于语文学之外的辅助措施和补充，而是同时担当三种角色和使命，它既是语文学知识的认知方式，又是建构语文学的首要方法论，还要为语文学知识的科学性提供保证。

伯艾克致力于将诠释学发展为语文学的普遍方法论，他在语文学领域推进和深化了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他试图建立一种系统的、能够指导语文学各门具体学科、普遍有效的解释方法论体系，事实上，他所建立的诠释学的确具有以往语文学家所不具有的系统性，体现在他对诠释学的基本任务、研究范围的界定，对解释类型的划分和阐述，以及对解释原则、规则和方法的探讨上。

与施莱尔马赫一样，伯艾克也要求诠释学是“普遍的”。首先，就解释的对象而言，在诠释学中并不存在特殊的差异，无需区分神学诠释学和世俗诠释学。在伯艾克看来，任何神圣的著作和任何天才的著作都必须同时通过理解的技艺和神性的启示两个方面来理解。真正的神圣之书必然也是人类之书，它也遵循人类的理解法则，它应该能够通过理解的技艺以通常的方式被理解；人类的精神根据理念的法则而构造，其中具有神性的东西，亦需要神性的启示去理解人类的独创性著作。其次，就诠释学一般原则的应用而言，在不同的解释对象中呈现出应用的特殊性，于是就有新约诠释学、罗马法诠释学、荷马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等，但这里只有解释素材的

不同，从根本上说它们属于同一种诠释学理论。

在解释形态的划分上，伯艾克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他把施莱尔马赫的语法解释和心理（技术）解释进一步拓展为语法解释、历史解释、个体解释和类型解释^⑤。前两者是基于客观条件的理解，后两者是基于主观条件的理解。语法解释旨在理解语词本身的客观含义；历史解释旨在考查语词使用的客观境遇；个体解释从作者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出发考查其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类型解释考查作者的主观境遇，不同的创作主体可能会具有共同的创作目的，形成特定的流派，创作特定的作品类型。这四种解释类型相互联系，相互过渡。

就解释的客观方面而言，伯艾克把语法解释拓展到历史解释。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伯艾克，都把语法解释的任务规定为确定语词的客观含义。施莱尔马赫认为，“语法解释的原则是含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⑥，语词的含义具有多样性，但基本含义只有一个，并且语词的诸多含义具有统一性，这源于语词的原始直观的统一性，语词的含义所涉及的范围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直观，这种基本直观决定着语词的基本含义，其他含义从这种原始直观中派生出来，这种统一性和客观性是语言传达信息和交往的基

① Friedrich Ast, *Grundriss der Philologie*（《语文学概论》），Landshut: Krüll, 1808, S. 1.

② August Boeckh, *Encyc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语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Hrsg. von Ernst Bratuschek, Leipzig: Teubner, 1886, S. 10.

③ 实际上沃尔夫也提出了这种要求，即古典文化百科全书不应该成为知识的收集和汇编，而应该是对古典文化知识的科学描述（参见 *Fr. Aug. Wolf's Vorlesung über die Encyclopädi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Hrsg. von J. D. Gürtler, Leipzig: Lehnhold, 1831, S. 5.）。在伯艾克看来，即使以往的语文学家对语文学知识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但事实上也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④ 在伯艾克的语文学体系中，诠释学和批评构成语文学各门具体学科的两大大方法论支柱，两者共同为语文学知识的科学性提供保证。

⑤ 历史解释并非伯艾克首创，此前沃尔夫已提出“历史的理解”，阿斯特提出“历史解释”。语法解释更是在以往语文学家和施莱尔马赫那里都有详细论述。伯艾克的主要贡献，一是他提出个体解释和类型解释；二是他对各种解释类型进行了总结提炼，并使之系统化。

⑥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诠释学》），Hrsg. von Heinz Kimmerle,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59, S. 40.

础。施莱尔马赫指出：如果说概念是科学的最高语言，那么隐喻则体现了语言的真正完满性，科学的概念最终来源于直观，因此对于语词来说最根本的是直观，而不是概念，如果忘记了这一点，语言面临的将是退化和死亡^①。伯艾克也认为，语词具有多义性，在诸多含义中有一种基本含义，这种基本含义天然是语言结构的根基，其他含义由此派生，“但不能说，每一语词和每一结构都有一个基本概念；因为概念必须要被定义出来，语言结构的基本含义却不是被定义出来的：它是一种直观”^②。语法解释的任务是理解每个语词的基本含义和具体使用范围。但在伯艾克看来，为了理解古典作品，只了解语词的客观含义本身是不够的，古典作品指涉相应的历史境遇，其含义不仅仅存在于语词本身，而且存在于语词之外的表象中，即“言外之意”，语言诉说的内容与历史提供的境遇处于现实的关联之中，对这种境遇的考查是历史解释的任务，由此，伯艾克把含义的客观方面从语法解释拓展到历史解释。历史解释的适用性有两条标准，一是当语法解释不足以澄清语词的客观含义时；二是在解释者看来作者明确或暗示地说出了一种历史关联。历史解释的界限不能超出语词的语法含义所允许的范围，即使在语法解释允许的地方，也不能给语词强加含义，超出作者的思考范围。越熟悉作者的个性和作品的内容、背景及类型特征，就能越好地把握作品中的客观的历史关联，因此历史解释又以个体解释和类型解释为前提条件。

就解释的主观方面而言，伯艾克把心理（技术）解释发展为个体解释和类型解释。伯艾克把从作者的主体性方面理解语词的含义看作个体解释的任务。他认为，作者的个性体现于语言表达之中，形成个体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作家对语词的选择和排列上，个性的统一性不依赖于个别的语词，而是体现在整篇作品的创作方式中，因此要从创作方式出发理解个性。另一方面，又要把这种结果反应用于对作品的理解，即从作者的个性出发理解作品。但伯艾克避免把个体解释称为心理解释，“因为这个名称太过了。如同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一种直观，这种直观不能把语词理解成定义，同样个体的风格特征也不能完全通过概念来描述，而要通过作为直观方式本身的诠释学直观地再创造出来”^③。实际上伯艾克与施莱尔马赫并非存在根本的分歧，无非只是对这

种解释的命名不同而已，因为施莱尔马赫也反对抽象主义的理解，不管是语法解释还是心理解释都必须立足于直观，以防落入抽象概念的空洞。至于“心理解释”这个名称为什么是过分的，伯艾克似乎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在基于主观条件的理解方面，伯艾克还把个体解释拓展到类型解释。类型解释大致相当于施莱尔马赫的技术解释，但伯艾克在这方面做了深入探讨。类型解释是从内在的、主观的关联来理解语言的主观含义，就像历史解释从外在的、客观的关联来理解语言的客观含义一样。与避免把个体解释称为心理解释一样，伯艾克也避免把类型解释称为技术解释，“因为个性发生作用时往往表现为个性倾向，并不具体地牵涉到脑海中呈现的某个意念。例如，个性的这种自由游戏发生在轻松的交谈中。相反，重大的思想关联则出现在封闭的讲话中，在这种讲话中，所有东西都指向一个特定的目的，其结果是事先考虑到的和通过方法所追求的东西。对于描述整个类型解释而言，这种表达还是过于狭窄。在轻松的言语游戏中，说话者也遵循着一个目的，例如交谈的目的；相对于语言作品的技术研究，它只是一种简单的目的，它允许个性自由地驰骋。由于目的总是一种思想，按其本性它具有普遍性特征，所以目的在讲话中的实现总是建立了某种讲话的类型”^④。对于类型解释，一方面要从创作方式中找出类型特征，另一方面要从类型特征出发解释个别的语言元素。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和心理学特征，如克莱森茨（Luca Crescenzi）所说，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对真理的理解显然只有采取个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形式才是可能的”^⑤。施莱尔马赫之所以将诠释学称作解

三

①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诠释学》), Hrsg. von Heinz Kimmeler,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59, S. 59.

② August Boeckh, *Enc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语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 Hrsg. von Ernst Bratuschek, Leipzig: Teubner, 1886, S. 94.

③ 同上书,第127页。

④ 同上书,第141页。

⑤ Günter Figal,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Hrsg. von Günter Figal, Akademie Verlag, Berlin, 2007, S. 79.

释的技艺(kunst),恰恰不是因为似乎通过机械地遵循特定的方法技巧就能够通达理解的真理,而是因为解释具有艺术性^①,在艺术中规则的运用始终是灵活的,天才本身创造规则,艺术创作需要天赋、灵感、感觉、想象力等非理智因素,解释如同艺术一样,有规则可循。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都不可能达到完美性,因为这需要以完善的语言知识和对作者个性的完全把握为前提,事实上这是达不到的,对个体的直观、个性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但无论如何,“对[解释]技艺的恰当运用基于语言天赋和对个体进行认知的天赋”^②。施莱尔马赫区分出两种天赋,即语言天赋和认识人的天赋,语言天赋又分两种,一是广度上的学习各种语言的天赋,二是深度上的进入内在语言之思想的天赋;对人类认知的天赋也分两种,即广度上的天赋和深度上的天赋。施莱尔马赫认为,不仅解释活动具有艺术特征,而且任何作品都具有艺术的特征,即使纯粹的科学著作,作者也总是以一定的方式(art und weise)把它写出来。即使这不是他的目的,即使是无意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科学描述的目的与艺术中的自我表现不同,它旨在传达一种客观信息和知识。在心理解释的任务中,必须要了解作者的意图,以及他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艺术形式,确定作品中有多少艺术成分,否则就无法重构作品的内容。心理解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理解作品和作者的个性,即使艺术作品描述的材料相同,但它们仍然可能存在个性上的差异性。在施莱尔马赫这里,对作品的理解最终归结为对作者的理解,作者的意图在理解中具有核心地位,只有那些具有与作者同等天赋的理解者才能通过心理移情置身于作者的立场,并使自己成为作者的原始读者和听众,理解作者的个性,重构作者的意图。

伯艾克的诠释学,由于对语文学领域的固守和方法论上的普遍化,具有更强的知识论色彩和理性主义成分。他一方面致力于古典语文学诠释学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又改造了心理学诠释学。与前者相比,他把诠释学提升为语文学的普遍方法论;与后者相比,他削弱了诠释学的浪漫主义色彩。伯艾克之前的语文学家已经把诠释学作为语文学的方法之一,例如,沃尔夫把诠释学、批判和语法看作语文学的准备学科,阿斯特把这三者看作语文学的补充(anhang)。但是,诠释学在他们那里尚未

形成一种普遍系统的方法论,施莱尔马赫对此不满,并致力于建立一种普遍诠释学;同时,黑格尔则建立哲学百科全书,并与他那个时代的语文学、历史学百科全书严格划界,“哲学百科全书不同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因为这种百科全书只是科学的汇集,这些科学是以偶然的、经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们徒有科学的名称,其实只是知识的汇编”^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伯艾克一方面反对黑格尔对语文学的蔑视和批评,另一方面他的确看到以往的语文学、包括其中的诠释学理论尚不具有科学性,“当黑格尔宣称语文学是[知识的]汇集,这一判断似乎基于沃尔夫[对语文学]的描述。沃尔夫把语文学描述为‘知识和信息的总体’”^④。由此,伯艾克为自己的语文学及其诠释学明确了坐标:语文学不应该成为零散知识的堆积,而应该是以科学概念作为根基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体系化描述,在体系化的描述中语法、诠释学和批判三者相互依赖。正是基于这种定位,伯艾克的语文学诠释学,与以沃尔夫、阿斯特为代表的传统语文学诠释学相比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普遍性,与浪漫主义诠释学相比具有更强的知识论和理性主义色彩。

综上所述,伯艾克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诠释学方法上的普遍化。其次,浪漫主义的无限逼近论在伯艾克的语文学诠释学中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语文学知识具有无限性的特征,对经典文本的再认知是一个辩证循环的任务,只能以无限逼近的方式完成;按照弗兰克的想法,以往的语文学家(如阿斯特)在普遍和个别之间臆想了一种等同性,即把个别的含义回溯到普遍的理性,以保证理解的正确性,并没有真正发展诠释学循环,施莱尔马赫却将诠释学循环在(下转第69页)

① Kunst 在德语中有两种基本含义:其一是艺术,其二是技术、技艺、技能。

②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诠释学》), Hrsg. von Heinz Kimmeler,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59, S. 82.

③ G. W. F.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部分》), Werke 8,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S. 61.

④ August Boeckh, *Enc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语文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 Hrsg. von Ernst Bratuschek, Leipzig: Teubner, 1886, S. 40.

(上接第 39 页)辩证法的意义上展开了,普遍和特殊的辩证中介运动是无限的,因而解释的任务也是无限的^①,在这一点上伯艾克也完全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再次,他同浪漫主义诠释学一样,反对片面的理性抽象方法,如抽象分类和概念式演绎,注重历史方法,从直观出发理解语词、作品以及作者的个性,重视直观在理解中的作用;理解者除了要具有理智以外,还要具有和作者同等的天赋,并具有语感、节奏感、直观能力、想象力等,置身于作品的历史情境和作者的立场,活生生地直观作品中描述的内容。

伯艾克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改造集中体现在他对古典与浪漫的调和上。他使诠释学服务于语文学的认知功能,削弱了诠释学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之保持在理性和科学范围内。诠释学为语文学全面认识古典文化服务,知识和认知在这里占统治地位,虽然他也强调对作者个性的把握,但其最终目的在于把握文本的思想内容和其中蕴含的知识,对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和知识的把握在这里处于核心地位,他也强调对作品的理解需要具有与作者同样的天赋,但这里同样重要的是理智和理性。实际上,对于伯艾克诠释学的归属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依笔者之见,认定伯艾克的理论存在矛盾有点言过其实,但说其属于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某种调和倒是恰如其

分。因为伯艾克本人不仅明确区分了理解和解释,而且他对理解和解释的阐述确实留下了这种调和的印记。在他看来,语文学是对已有知识的再认知,这种再认知是理解,解释的目的指向理解,使经典文本成为可以理解的。对于解释而言,对应于一套系统的规则和方法,更加侧重理性层面;而对于理解而言,语感、节奏感、直观力、想象力等和理性同样重要,相互补充。因此,基于伯艾克的这种调和立场,把他的诠释学冠以“语文学诠释学”的名称应是一个更妥当的选择。

(本文作者:牛文君 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彭启福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景来

---

①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k und Kritik* (《诠释学与批评》), Hrsg. von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 S. 23.